

# 薪火学刊

第一卷

薪火学刊编辑部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 新大學刊

第二卷

2012年12月

ISSN 1673-1395

# 薪火學刊

第一卷

薪火學刊編輯部 編

 復旦大學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薪火学刊. 第1卷/薪火学刊编辑部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9-11142-2

I. 薪… II. 薪…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丛刊②古文学-中国-丛刊  
IV. ①I206.2-55②G2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6548号

刊名题字: 据《鲁迅手稿全集》集字

薪火学刊. 第1卷  
薪火学刊编辑部 编  
责任编辑/杜怡顺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5 字数 251 千  
2014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1142-2/1 · 879  
定价: 32.0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卷首语

章培恒先生今年冥寿八十，谨与诸位作者一起将本刊首卷作为一束心香敬献于先生灵前。

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的学者，一生追求真理，视学术超越生命，“纵罹灾厄，不改初衷”。本刊意在筑一平台，学生辈诸君愿藉此聚会交流。“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道不远人，薪尽火传。

本刊的主体为“切磋篇”，主要发表学生辈（含再传）富于创见、承继着先生学术精神的研究成果；“风范篇”主要发表戚友学生们撰写的展现先生及其师辈道德风范与人格魅力的纪实性文章。

感念师恩，莫高于弘扬其道德，光大其学术；思慕戚友，无贵乎描绘其风范，传扬其精神。期待着您精心结撰的鸿文！

# 目 录

## 20 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

- 兼述其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关系…………… 章培恒( 1 )

## 风范篇

- 二十八年交亲的追忆…………… 安平秋( 18 )

### 入门引路第一人

- 怀念章培恒先生…………… 黄 霖( 23 )

- 舅舅的兄弟姐妹们…………… 叶灿芬 沈惟中( 32 )

## 切磋篇

- “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创始人章培恒先生…………… 梅新林( 35 )

- 增田涉与《中国小说史略》的翻译…………… 井上泰山( 59 )

- 明末戏曲评点的发展与演变…………… 吴冠文( 79 )

### 明代后期嘉定文人群体诗学旨趣论析

- 以徐学谟及“嘉定四先生”为中心…………… 郑利华(108)

- 梁陈宫体文研究…………… 徐 艳 朱佑伦(132)

中国近世文学思想史断想·····	陈广宏(174)
风景的变迁	
——中国古文中的自然·····	邵毅平(185)
意图叙事说·····	许建平(209)
清人刻书妄改前人序文二例·····	钱振民(234)
杨维禎墨迹《张氏通波阡表》考论	
——兼谈近世文人别集整理中的版本问题·····	孙小力(243)
萨都刺“《三顾草庐图》题识”真伪考辨	
——兼答杨镰先生·····	杨光辉(261)
从周边国家汉文文献的编纂看历史上中国在东亚的 主导地位·····	韩结根(271)
稿约·····	(298)

# 20 世纪以来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

——兼述其与中日文化交流的关系\*

章培恒

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学研究,本土学者当然具有天然的有利条件。但从该学科在 20 世纪的本土发展来看,它的得失又与对外的文化交流密切相关;而中日的文化交流又是其对外文化交流的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对其本土的文学研究也就关系重大。我拟对此稍加阐述,以期从一个方面说明国际文化交流对本国文化传统的研究的意义。

—

中国的本国文学研究在 20 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最根本的就是研究观念和方法的现代化,由此而在研究内容上有了

---

\* 本文系章培恒先生遗稿,为作者应邀于 2006 年 10 月参加日本关西大学 120 周年纪念讲演会而提交的讲演稿。今由日本关西大学井上泰山教授、京都文教短期大学林雅清专任讲师寻出提供。



重大的推进。主要有如下四项:第一,脱离了以文学作为政治教化的工具的传统观念,而把文学作为以语言为工具的、具有美感形式的人性的表现,从而把文学的发展视为人性和美感形式的综合的发展。对于文学的评价也以此为标准。第二,改变了在文学中轻视小说、戏曲的传统观念,而把它们提到了与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同时改变了把“文”全都视为文学的传统观念,而对“文”中的文学作品与非文学的文章加以区分。第三,建立了文学史的观念,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开始进行系统的清理与研究,建设了“中国文学史”学科;除设置了“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民间文学史”(以及与之相通的“俗文学史”)等分支学科外,并开始对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加以关注和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起又有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第四,出现了大量对作家、作品的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新颖研究,这也是中国的传统研究所没有的(以前只有作家年谱、传记和偏重于感兴式的评论)。以上只是就主要的方面而言,还有好些不计在内,例如目前已经开展起来的文体研究。

在对中国自身的文学研究中,历史悠久的古代文学的研究当然占有很大的比重;但只有对现代文学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后,才能提供对古代文学的发展进行全面考察的依据。如果就研究成果的时间顺序来说,那么,体现了上述新趋势的文学研究里最先出现的是作品研究,以1905年王国维(敬称一般从略)的《〈红楼梦〉评论》为最早的杰出代表,

他根据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哲学思想和美学理论来阐述《红楼梦》的意义和价值,而且相当深入;从上世纪20年代起,胡适又先后发表了《〈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论文,以现代观念对古代作家、作品所做的专门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后陈寅恪所作《元白诗笺证稿》和《论〈再生缘〉》,就把这一类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其次是中国文学史著作的出现,以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为最早,但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因为它把太多的非文学的东西包括在内,小说、戏曲等反而不列入。从1907年开始陆续出版的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则已是较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了。至1932年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1940年、1949年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册分别出版,中国文学史学科由此确立。第三是中国文学史的分支学科方面的成果。王国维于1913年完成了《宋元戏曲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于1923年、1924年分为上下册先后出版,“中国戏曲史”和“中国小说史”这两个分支学科正式成立。1934年,罗根泽、郭绍虞先后出版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名的著作(罗书叙述至六朝而止,郭书为上册,至北宋);1944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从先秦至清末的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第一次获得了较系统的、虽然是初步的梳理(陈钟凡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一直叙述到清代,但全书只七万字)。此外,北京大学部分师生在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了歌谣的收集、研究工作,发表研

究成果,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开端。第三是现代文学的研究。1932年周作人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把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新文学的出现与古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加以探讨,这既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指示了一条新的途径,又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深具启示意义。1935年由胡适、鲁迅、郁达夫、周作人等分别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出版,则已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中国新文学大系》每卷卷首均有导言,正如曹聚仁所说,如果把各卷导言“汇刊起来,也可说是现代中国新文学的最好综合史”<sup>①</sup>。

从以上这些著作出现的时间来看,可以说中国的本国文学研究方向的确立和各个研究领域的奠基,都已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间基本完成。以后则是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了。例如,陈寅恪在上世纪50年代完成的《元白诗笺证稿》和《论〈再生缘〉》,把作家作品的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上世纪40年代后半叶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出齐,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脉络的勾勒较《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更为清晰;1944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出版后,中国遂有了较完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而这些成果都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研究原则和方法的深化。

不过,从20世纪的中、后期之交开始的三十余年间,中国的本国文学研究一度发生过停滞乃至曲折,创造性有所减弱;当然仍有若干进展。如上举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

<sup>①</sup> 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香港新文化出版社,1973年,第172页。

史》下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等；此外尚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夏承焘的唐、宋词研究等，但就总体成就而论，显然已大不如以前了。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中国的本国文学研究又重新走上了向前推进的道路，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因时间较近，一切都还在进展之中，仅能就我所认为最值得注意的谈几点：第一，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继承《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传统，恢复了从文学本身出发并注意实证的道路，代表性著作有钱理群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第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以罗宗强为首，开辟了两个新的研究领域：文学思想史、文人心态学。文学思想史是把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学思想作综合的研究，文人心态学则是抉发各时期文人的心态及其演变，作为研究文学发展的一种视角。第三，将文学作为以语言为工具的、具有美感形式的人性的表现观念得到了进一步贯彻。这种观念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虽已形成，但也经常受到批评，后来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更被作为反动观点。现在则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也已有学者加以运用，并获得热烈反响。代表作是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及《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第四，对中国文学（含文学批评）史料的较大规模的收集和梳理，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等。第五，大型的文学文献的辑集与编纂，最具

代表性的是傅璇琮、安平秋、孙钦善主编的《全宋诗》。当然，曾枣庄等主编的《全宋文》是更巨大的工程，但那是综合性的文献整理。

以上所述很不完整。因为研究成果很多是由对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的个案研究来体现的，而举此类成果是必然会落入顾此失彼的困境，所以只好举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学界巨子的论著为例。

## 二

现在简述中国的本国文学研究与对外文化交流的关系，尤其是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

在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屡遭挫折；到19世纪末，中国的文化与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已有了相当大的距离，不得不积极地向外吸取文化营养。吸取的渠道，一是欧美，一是日本；由于地缘和文化接近的关系，在开始的阶段向日本吸取的比直接向欧美吸取的为多。何况在中国文学的研究上，当时日本学者的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欧、美的学者，故其对中国本土的文学研究的影响也较后者深广。

先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来看。中国人自己所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卷首题记中就表明：“则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

意以成书焉。”不过,其书内容庞杂,算不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史著作,也看不出其受过笹川氏的影响。这些话只能看作是他的自我标榜。因为此书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的讲义,而当时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中已规定大学要设“中国文学”一课,并说:“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撰讲授。”<sup>①</sup>所以,林氏的这些话大概只是为了表明他的这部讲义是符合《章程》的规定的。

但林氏此书之后的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确是受了其先行日本学者同类著作的影响的。因为黄人懂日文,他对中国文学的分期又显然采用了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法;同时,此书关于文学的义界虽不如今天的明晰,但较之林氏之书已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黄人在写作《中国文学史》时中国学术界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尚无明确的划分,且又轻视戏曲、小说,不屑一顾;林氏之所以把许多非文学的东西纳入文学史而不收戏曲、小说就正是根据中国传统的关于文学的概念,黄人在这方面的水平实已超出了当时中国学术界的水平。而就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来说,则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1898,博文馆)、久保天随的《支那文学史》(1903,东京人文社)对文学与非文学都已有了比较符合于文学(literature)义界的划分,笹川之书已列入小说、戏曲,久保之书又进而增入了词。黄人这部书在

<sup>①</sup> 参见陈广宏《秦纳的文学史观与早期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构建》,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卿云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71—472页。

文学史的分期上既受有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法的影响,那么,他在对文学的义界方面的理解也是借鉴了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吧。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然后于黄人的书二十余年,但在文学史的分期上仍然沿用了黄人的模式,尽管具体的分法有所不同。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改用朝代分期法,在这方面消除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直到上世纪90年代,古代、中世、近世、近代这样的文学史分期法才又在中国的文学史研究中开始出现)。不过,作为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的刘氏,同时却把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精粹进一步引入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自己叙述其文学史观的形成说:“在文学理论上给我影响最深的,……是下列这几种:1. 泰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sup>①</sup>而在日本,以泰纳的学说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却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的,而且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成果。刘大杰把泰纳的《艺术哲学》和《英国文学史》列于奠定其文学史观的著作的首位,正是其在日本留学的收获。

再看20世纪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最有成就的五位学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周作人——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关系,除胡适留学于美国、深受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可不置论外,陈寅恪虽长期留学于欧美,但早年也曾留学

<sup>①</sup> 刘大杰《批判〈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收入《〈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

日本(1904—1905),其后因病辍学,但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实有相当深的了解(参见下引《王观堂先生挽词》及注),而且其研究中国文学的论著中喜用“物语”一词(如《元白诗笺证稿》的第一章论《长恨歌》的部分即不止一次出现),这其实是日文汉字(ものがたり);中文中并无这样的用法。所以,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也不可能是与日本的中国学绝缘的。

王国维写的《〈红楼梦〉评论》固然主要源自叔本华哲学,而且他所阅读的是英文本。但他早年留学日本,在留日之前即曾从藤田丰八学习日文;辛亥革命后再度赴日,与日本学界有了更多的接触。故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附注释)说:“……回望觚棱涕泗涟,波涛重泛海东船(注:先生早岁游日本,清帝逊位后复从罗叔言重游日本)。……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注:日人藤田丰八、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内藤别号湖南。罗先生昔年在上海设东文翻译社,延藤田丰八讲授日文。先生从之受学。故此句中三人中列藤田第一,不仅音韵关系。至于内藤虎列第三,则以虎字为韵脚之故,其实此三人中内藤虎之学最优也)。”<sup>①</sup>在这三位日本学者中,王国维接触最早的藤田丰八就是日本早期的以泰纳学说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有影响的学者之一,1897年即刊有《支那文学史稿·先秦文学》(东华堂)。

① 《王观堂先生挽词》之收入《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所附《寅恪先生诗存》者附有注释,并有如下说明:“癸巳秋游粤,侍师燕谈,间涉及晚清掌故及与此诗有关处,归后因记所闻,笺注于诗句下。甲午元夕补记。”故知注释为《寅恪先生诗存》的编者蒋天枢先生所加,而实出于陈寅恪先生自述。



该书《序论》在论述“文学史之考核方法”时指出：“盖时为历史之经，外围为历史之纬，人类之特性缘此经纬织出一种历史现象。文学史亦然。对于文学现象加以历史性考核，单就此现象，不足以阐明国民思想感情的推移。”又说：“余对文学现象，观察时与外围与人，以叙述此想与形与其变迁，务发挥支那文学之幽光。”所谓“外围”当指环境，“想”为缘于内者，“形”为现于外者，当分别指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思想感情及体现此种思想感情的作品的样相。这正是泰纳学说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运用。与此同时，他又是开创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重视小说、戏曲的风气的最有影响的日本学者之一。在1897年5月出版的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中尚未述及小说、戏曲，而藤田氏于1895—1897年间的东京专门学校文科讲义——《支那文学史》虽只述至东汉，但已有“小说的萌芽”一节；在他与笹川种郎、田冈岭云、白河鲤洋、大町桂月著的《支那文学大纲》（1897—1904）中，更对小说、戏曲作家李渔、汤显祖列有专论。而笹川种郎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东华堂）也即出版于1897年，在该书中他并认定“支那文学的特色在此”<sup>①</sup>。

正因藤田丰八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具有这样的业绩的学者，而王国维与他的交往又不仅是在早年向他学习日文而已，从陈寅恪“东国儒英谁地主，藤田狩野内藤虎”之句可

<sup>①</sup> 本文述及藤田丰八、笹川种郎等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学研究的业绩者，皆据陈广宏教授的专著《泰纳的文学史观与早期中国文学史叙述模式的构建》。